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夏《功德宝集偈》
跨语言对勘研究

段玉泉 著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杜建录 波波娃 主编

西夏《功德宝集偈》
跨语言对勘研究

段玉泉 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成果（08BMZ013）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 / 段玉泉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2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7367-7

I. ①西… II. ①段… III. ①西夏—佛教—文献—研究 IV. ①K246.306②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247 号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书 名 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

作 者 段玉泉 著

责任编辑 王 珺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 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印 刷 金坛古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1 字数 380,000

国际书号 ISBN 978-7-5325-7367-7/K · 1918

定 价 78.00 元

宁夏大学“提升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项目”资助出版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编委会

顾问：史金波 李范文 克恰诺夫

主编：杜建录 波波娃

编委：（以姓氏笔画排序）

孙伯君	孙继民	李华瑞	杨浣	沈卫荣	佟建荣
林英津	荒川慎太郎	胡玉冰	段玉泉	聂鸿音	
索罗宁	梁松涛	彭向前	韩小忙	景永时	薛正昌

总 序

西夏在中国，大量的西夏文献收藏在俄罗斯，西夏研究成为中俄两国共同关注的学术领域。为此，2009 年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将“西夏文化研究”列入两国语言年活动项目，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和宁夏大学承担。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签订协议，成立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机制下研究机构——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任中方所长，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教授任俄方所长。

2010 年 7 月 26 日，我利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银川学术年会间隙，专门考察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该院主持完成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说西夏》等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教育合作分委会主席，我高兴地看到，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每年都有新成果、新亮点。2010 年 9 月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宁夏大学揭牌，2011 年 9 月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揭牌。连续召开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一批西夏学中青年骨干赴俄罗斯访问研究。更令人欣慰的是，两国学者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往来上，而是围绕西夏法律文献、社会文书、佛教典籍等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相继完成“西夏社会文书研究”、“夏译《孟子》研究”、“天盛律令研究”、“党项西夏碑刻研究”、“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释录”等课题，陆续出版的《西夏文献研究丛刊》和《黑水城出土汉文社会文书释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源远流长，上世纪 30 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刊出西夏文专号，中苏等国西夏学者发表成果，相互酬唱，成为佳话；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学者联合整理出版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进入新世纪，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框架下的西夏学合作研究，是在西夏文献整理出版基础上的深入研究，相信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教育合作分委会中方主席

郝 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目 录

总 序.....	郝 平 1
引 言.....	1
研究篇.....	9
一、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综考	11
(一) 西夏文本残卷的判定	11
(二) 西夏文本残卷序说.....	17
1. 国内藏卷.....	17
2. 英国藏卷.....	19
3. 日本藏卷.....	25
4. 法国藏卷.....	26
5. 俄国藏卷.....	27
(三) 西夏文译本的成书年代及版本	30
附：西夏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订一览	34
二、西夏文本的汉藏对勘材料.....	41
(一) 房山云居寺汉文本	41
(二) 两个不同的藏文本	45
1. 房山云居寺本.....	45
2. 俄藏黑水城出土 XT16 号藏文文献	47
3. 黑水城出土 XT16 号藏文文献与房山云居寺藏文本的关系	48
三、《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在西夏的传译过程.....	49
(一) 西夏诸本的传译者	49
1. 贤觉帝师波罗显胜.....	51
2. 五明显密国师噶也阿难捺	56
3. 演义法师遏啊难捺吃哩底.....	60

4. 显密法师周慧海.....	62
5. 汉译本作者鲜卑宝源.....	65
(二)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诸本间的关系.....	69
1. 周慧海西夏文译本的翻译底本.....	69
2. 西夏文译本依据的藏文底本为西夏重新译出.....	74
3. 周慧海译本与宝源汉译本的关系.....	76
4. 流传脉络.....	78
(三) 西夏藏传佛教文献翻译过程中的梵译与梵本问题.....	79
四、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集偈》与《功德宝集偈》的关系.....	83
(一) 关于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集偈》.....	83
(二) 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集偈》与《功德宝集偈》文本之比较.....	88
(三) 周慧海译本与金刚王译本流传之比较.....	93
五、结语.....	95
对勘篇.....	99
凡例.....	100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上)夏汉藏对勘.....	101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中)夏汉藏对勘.....	189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下)夏汉藏对勘.....	220
参考文献.....	286
附 录.....	293
一、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293
二、佛教词语对照表.....	316
三、藏文字母转写符号对照.....	329
后 记.....	330

引言

1983年,罗炤先生发表《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一文,人们始知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藏有一部西夏仁孝皇帝时期翻译的佛教文献。^①这部作品是明朝正统十二年的重刊本,但保存的题记不仅详述了其在西夏时期的传译情况,而且还让我们首次知道,除了现有的汉、藏文两种文本外,这部文献还有一种西夏文译本。几乎在同一时间,西夏学界就印证了这一事实,陈炳应先生在天梯山石窟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发现了这一文献的西夏文译本残片。^②时至今日,相关的残件已大量呈现在我们面前。西夏文献中,夏、汉两种文本俱存的文献资料目前所知甚少,而兼具汉、藏及西夏文三种文本的材料殊为罕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夏、汉、藏三种文本同时存在,这在西夏文献学研究领域非常罕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领域也不可多得。这一文献还涉及到西夏佛教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即有部分文献曾被认为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支撑其观点的例证材料正是这一文献。^③西夏佛教史上可能有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但这类作品应该不会很多,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否直接从梵文翻译而来,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怀疑。材料的特殊性及其在佛教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使得这一文献颇受学术界关注。

一、研究对象的限定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佛教典籍般若部的一部重要著作。作品以偈颂形式呈现,全文共302偈,内容是对广、中、略三大般若的总结。这一文献除本文

① 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4—36页。

②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46页。

③ 云居寺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汉文题记中有“遏啊难捺吃哩底 梵译”及“嚧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义”的记载,罗先生由此指出,此佛经的汉文本直接由梵文本翻译过来,具体翻译过程是首先自梵文译为西夏文,然后又仿照西夏译文的格式译为藏文和汉文。参见罗炤上揭文。1988年,季羨林先生发表《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文章引用了罗先生关于此佛经汉文本译自梵文的观点,并推论西夏文本应十分忠实于梵文原本的观点。参见季羨林:《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原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四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又见《季羨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564页。此后大量的作品在谈及这一论题时几乎采用了这一观点。

讨论的西夏时期的译本外，目前还发现有梵、藏、汉、蒙等多种文字的各种不同文本。其中的梵文本，由日本著名梵文学者汤山明博士(Dr. Akira Yuyama)进行了详细的校勘和深入研究，并区分出 A 本和 B 本两种类型。^①季羨林先生则利用梵文本证实古代印度西北方言-am>-o, -u 的语言变化特点，并进而探讨般若部乃至大乘佛经的起源问题。^②此文献的藏文本除房山本外还有很多，不但多种《西藏大藏经》中皆有入藏，黑水城、敦煌亦皆有出土。汤山明博士在区分两种梵文本(Sanskrit Rrcension A and B)之后又区分出了相应的藏文本 Tibetan Rrcension A(or Tunhuang Rrcension)和 Tibetan Rrcension B 两种。《西藏大藏经》入藏者皆属藏文 B 本。^③汉文本则有宋代的法显译本。^④蒙古文大藏经也保存了这一部文献的蒙文本，日本学者樋口康一有过此方面的专门研究。^⑤本文的研究限定于西夏时期的三种文字作品，共四种文献。其一即房山云居寺的藏、汉合璧本，包括藏、汉文两种译本，这虽是明代的重刊本，但不排除其文本内容保存了西夏时期的原貌，至少也可以说是比较接近于西夏原本。其二是利用目前出土各种残件拼配出来的周慧海西夏文译本。这一译本题记与云居寺藏、汉合璧本题记一致，可以看做是同题、同源的“同时”材料。其三是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异译本，即座主比丘功德金刚王译本。第四是黑水出土的藏文残本。

二、研究史的回顾

学术界对西夏时期创作《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这一作品的关注首先从罗炤先生一文开始。罗先生一文首先详细介绍了云居寺藏、汉合璧本中的一则汉文题记，依据这一题记始知这部发现于北京房山云居寺、刊于 1447 年的明代版本藏汉合璧佛经是在西夏仁宗时期完成的译作。其汉译本，由西夏僧人鲜卑宝源翻译而成。其藏译本，罗先生认为，与德格版、北京版在章节、品目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不是

① 除汤山明外，孔策(E. Conze)、欧伯米勒(E. Obermiller)也做过梵文本的相关整理与研究。汤山明博士的相关著作有：(1) *A Grammar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Sanskrit Recension A), Faculty of Asia Studies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1973; (2)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 gāthā* (Sanskrit Recension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季羨林上揭文。

③ Akira Yuyama,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 gāthā* (Sanskrit Recension A), p. xxiii-xxxviii.

④ 法显译本名为《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每偈 7 字。详见《大正新修大藏经》No.229。

⑤ 樋口康一相关的研究有：(1)《〈宝德藏般若〉の蒙古語訳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 67 卷第 1 号，1987 年，第 182—156 页；(2)《蒙古語訳〈宝德藏般若〉の研究》，(广岛)溪水社，1991 年。

同一译本,而是同一部佛经之异译本;而且,这一译本非是西夏原刊,而是明代正统年间的重刊本,经由了明代在北京的西藏大喇嘛班丹札释的重新校证。根据题记中“遏啊难捺吃哩底 梵译”及“嚞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义”的记载,罗先生指出,此佛经的汉文本直接由梵文本翻译而来,具体翻译过程是首先自梵文译为西夏文,然后又仿照西夏译文的格式译为藏文和汉文。^①1988年,季羨林先生发表《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文章引用了罗先生关于此佛经汉文本译自梵文的观点,并推论西夏文本应十分忠实于梵文原本的观点。^②

2008年,史金波先生提到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保存了《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一个藏文残本,即XT16。^③此后,苏航先生对这一残本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其与房山云居寺等诸藏文本之间的关系。^④显然,这应该就是西夏时期的一个版本,遗憾的是它保存下来的内容实在是太少了。

此佛经的西夏文本最早著录于《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书中作者对这一著作可能还未有深刻认识,将其置于多个条目之下,翻译为“圣胜慧彼岸到德用宝集颂曰”、“集颂般若波罗蜜多经”、“集颂”等。^⑤1983年,陈炳应先生在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文献中发现了这一文献的残片并作介绍。^⑥此后,荒川慎太郎先生就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藏的两个残片进行了考证,并与德格版藏文本作了比较,指出西夏文本颇忠实于藏文本;^⑦自2006年以来,笔者开始从事着这一文献各种残片的考释、整理和拼配工作,至2009年基本上完成了已刊布文献资料中所有属于这一文献残片的判定工作,并与房山藏、汉合璧本进行了三种文本的对勘。^⑧与此同时,松泽

① 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第4—36页。

② 季羨林:《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第564页。

③ 史金波:《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献简介》,“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会议论文,2008年。

④ 苏航:《西夏时期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研究——以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献XT16及相关藏、汉、西夏文文献为核心》,载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103页。

⑤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 94, 97.

⑥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第46页。

⑦ 荒川慎太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中西(亮)搜集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断片》,《内陆亚细亚研究》18号,2003年。又见《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夏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3—418页。

⑧ 段玉泉:《甘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释》,载《西夏学》(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2—109页;《中国藏西夏文文献未定名残卷考补》,载《西夏学》(第三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论》,载《西夏学》(第四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109页;《语言背后的文化流传——一组西夏藏传佛教文献解读》,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62—117页。

博、崔红芬等分别对日本藏、英藏西夏文献中的部分相关残片进行考证,^①苏航则致力于多文本的语言对勘,其关于西夏文本译本的来源亦与笔者及荒川慎太郎相同,都倾向于这一西夏文献自藏文翻译而来,但于汉文本的来源,他提出可能是在西夏文本的基础上,参考藏、梵文本译出。^②宗玉嫩则利用与藏文本的比较,提出房山汉文本应该直接译自藏文,其藏文本应该与藏文B本非常相近。^③

众人齐集于同一部佛教文献,实在是因为其夏、汉、藏三种文本同时存在,这样甚为罕见的材料在所存西夏文献中不可多得,而且三种文本都采用十一字(音节)一句,这在佛教翻译史上又是比较特殊的现象。重要的是,三个文本之间的源流关系依然处于纷纭之中。最近胡进杉先生又探讨了笔者此前所未见到的俄藏西夏文献中的另外一个译本——九字本,并与十一字本作了初步比较,^④这又给本研究增添了更多新的话题。

三、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西夏文献解读为突破口,充分利用藏学界、梵文学者已有的解读成果,开展夏、汉、藏三种文本的对勘。藉以多文本跨语言的详实比较,解决它们在流传过程中的源流问题。这一研究于西夏学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拓展了西夏学研究的方法与思路。西夏佛教文献的解读多是建立在以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为出发点的基础之上,以往的解读或者以汉文本、或者以藏文本为对勘材料进行。夏、汉、藏三文本的对勘改变了以往单纯以夏、汉对勘或者夏、藏对勘处理西夏文献的方法。这一方法得以进行,是由这一组材料同时具有同源的三个文本的特殊性决定的;这一方法成为可能,是因为其中的藏文本大多已为藏学界所处理;这一方法显得必要,是因为可以透过语言比较解决佛教文献流传过程中

① 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4),《东洋史苑》第70、71号,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2008年,第1—24页。崔红芬:《英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叶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84—87页。

② 苏航:(1)《西夏时期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研究——以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献XT.16及相关藏、汉、西夏文文献为核心》,第102页;(2)《〈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梵、藏、夏、汉本对勘研究——第一品(一):第1—10颂》,载《西夏学》(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4—121页。

③ 宗玉嫩:《论云居寺汉译〈宝德藏经〉的翻译底本问题——以第一品为讨论中心》,《圆光佛学学报》第16期,台北,2011年,第84—106页。宗玉嫩此前亦有《宝德藏经》的相关论著,见《从〈空品〉看〈宝德藏经〉与〈般若波罗蜜经〉关系》,《圆光佛学学报》第12期,台北,2007年;《〈宝德藏经〉与〈般若波罗蜜经〉关系探微——以第一品为中心》第14期,台北,2009年。

④ 胡进杉:《西夏文九字本〈圣胜慧到彼岸集颂〉译》,载黄建明、聂鸿音、马兰主编:《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54—135页。

各译本的源流问题。由跨语言的多文本比较、透过语言文字线索解决佛教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突破了以往对勘以语言研究和文献研究为目的的研究思路，也突破了以往佛教文化史研究过程中单纯依靠题记等外部信息、特征推导结论的做法。

其次，于西夏藏传佛教研究乃至民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被学术界反复用来证明西夏有直接译自梵文的经典。本论文三种文本的初步对勘表明，西夏文本与藏文本有着惊人的吻合，或许就译自藏文。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全面对勘之后做出回答。果真如此，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比目前所了解的要大得多。而这三个文本流传和翻译的细节，对于研究西夏佛教乃至民族文化交流无疑增添了更多清晰和细节性材料。

最后，此类对勘虽然是希望以语言线索解决佛教文化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却极大地推动了西夏语言学本身的研究。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经解读成果或片段、或短小经、或部分章节，屈指可数，却展现出忠实于原文的显著特征，这尤其表现在词语方面。本课题初步的对勘，已让我们领略出同期、同题、同源多文本语言对勘于西夏语词汇研究的美妙之处。例如，西夏文本中出现的“出有坏”（逐字对译为“坏-有-出”）一词，宝源汉文本以“世尊”相对，藏文本则以 bcom ldan 'das 对。藏语中，bcom 意为“摧毁”、ldan 意为“具有”、'das 意为“超出”，正与西夏本相合。显然，西夏语中的“出有坏”即“世尊”，是源自藏文的佛的名号。三种文本对勘的美妙之处在于，与汉文本对，使我们明确了“出有坏”的所指，即佛的名号；与藏文本对，则让我们清楚了这一词语的来源。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正是多文本跨语言对勘的美妙之处。

多文本跨语言对勘不仅有助于增添对西夏语词语的认知，也有助于推动西夏语法的研究。词语翻译可以十分忠实于原文，但翻译出来的句子必须符合自身的语言规则。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汉文翻译成西夏文、还是从藏文翻译成西夏文，翻译出来的句子必须不能背离西夏语的语法规则。两种语言文本材料间的对勘，对于是翻译表达的需要还是西夏语自身的规律，往往难以分辨清楚，而三种文本的对勘则有助于将非自身语言规律性的因素排除出去。例如西夏语中的虚词“𐽄” mo²，根据以往的夏、汉对勘材料，一般将其当作句末语气词处理，相当于汉语的“乎”，而本课题夏、汉、藏三种文本的跨语言对勘表明，它还可以作选择连词使用。

本研究主要运用多文本跨语言对勘法，即通过共时、同源的几种语言文本材料进行多文本对勘以及由此而进行的跨语言比较研究，利用语言翻译过程中遗留的诸

多事实探讨民族文献乃至文化的流传。跨语言对勘、比较研究用于西夏学研究并非什么新方法，早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王静如先生就利用了这一方法。王先生详细比较的一部作品是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他通过与汉、藏文比较之后，写成《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一文。^①此文用跨语言对勘方法于西夏语解读，“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国人中盖王君静如始。然则即此一卷佛母孔雀经之考释虽其中或仍有俟他日之补订者，要已足开风气之先，而示国人以治国语之正轨，询可称近日吾国学术界之重要著述矣”^②。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此文的确开西夏语研究方法之先河，只是由于材料所限，王先生只能以传世的各种汉文本以及北京版藏文本为对勘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夏学领域再也未见有学者使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本文只不过是重新拾起王先生使用过的方法，并加以限制，即限于共时、同源的多文本语言材料进行对勘，这样限制不是自我有多高明，实在是笔者今天有幸能够遇到这样特殊的一类材料，于是用王先生的方法“旧瓶装新酒”了，同时也因为西夏学现实研究中遇到的诸如文化流传的分歧而特别需要用跨语言对勘方法解决部分的历史文化问题。本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就是以西夏文本解读为出发点，以共时、同源的汉、藏文本为对勘材料（必要时也适当参考汤山明博士等对梵文本研究的成果），运用多语言对勘方法处理西夏文本，重点进行词汇的考证、比对，判断西夏文本中哪些词语与梵文本接近、哪些与藏文本接近、哪些与汉文本接近，力求理清西夏文本中每个词语的意义及其来源，进而以语言事实解决佛教文献传译过程中的源流问题。

在具体的词汇考证过程中，文章中还用到排比归纳法。排比归纳法是汉语训诂学中常用的方法，清儒经常使用这一方法，解决了训诂学中的很多难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五《毛诗上》中谈到其父王念孙关于《诗经》中“终风且暴”条的解释，兹引如下：

家大人曰：“《终风篇》：‘终风且暴。’毛诗曰：‘终日风为终风。’韩诗曰：‘终风，西风也。’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尔雅》曰：‘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焚轮谓之颙，回风为飘。’以上六句通释《诗》词而不及终风。又曰：‘日出而

① 王静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西夏研究》（第一辑），中研院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八，1932年，第181—250页。

② 陈寅恪：《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西夏研究》（第一辑），第v页。

'on kyang bsam gtan yan lag bcas pa bzhi bo 'di

尔亦 静虑 支分 所有 四 此

(29/01/3)

“𑖃𑖦𑖪”在文中多次出现，可以认定是固定组合，临时连用。第1句，藏文本中对应词语是 *bcas*，汉文本对应词作“俱”；第2句，藏文本作 *bcas pa*，汉文本未曾出现；第3句，藏文本亦作 *bcas pa*，汉文本作“所有”。第1句藏文本中 *bcas* 的完整形式应该是 *bcas pa*，因为受每句11音节的限制，藏文中的很多词语以省略形式出现，这在该文献中是常见的，西夏文本也存在类似情况。*bcas pa* 在藏语里有“兼、带、有”的意思，和汉译本中的“俱”、“所有”亦完全吻合。通过这样的排比可以归纳出，西夏语中，“𑖃𑖦𑖪”的准确含义应该是“俱、所有”。